

# 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專題研究計畫成果報告

## 上海區域經濟及都市空間結構之轉化： 一個歷史的視角

The Transformation of Regional Economy and Urban  
Spatial Structure in Shanghai: A Historical Perspective

計畫類別： 個別型計畫 整合型計畫

計畫編號：NSC 88-415-H-002-033

執行期限：87年8月1日 至 88年7月31日

計畫主持人：夏鑄九

執行單位：台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

中華民國八十八年十月十三日

# 上海區域經濟及都市空間結構之轉化： 一個歷史的視角

The Transformation of Regional Economy and Urban Spatial  
Structure in Shanghai: A Historical Perspective

## 中文摘要

上海在近代中國經濟發展歷史中一直是站在領導地位的城市。本研究關心上海在中國國內與國際經濟上的角色，為何被視為區域發展之龍頭，以及，都市計畫如何做為發展之工具，在其間，中央與地方政府的角色為何？本研究旨在提供上海之經濟和都市結構的歷史回顧，以做為進一步研究的初步分析架構。

**關鍵詞：**上海、區域發展、都市結構、都市計畫、規劃史體系、

## Abstract

This project tries to offer a historical analysis of the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and changing urban structure of Shanghai. We'll demonstrate Shanghai's specific role in the national economy, and try to focus on the tension between central-local relations and the role of local dynamics. We'll also illustrate the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of Shanghai after the economic reform, particularly places emphases on the shifting policies and the fast development in the 1990s. Finally, We'll propose a framework to analyse the social impact of urban restructuring in Shanghai.

**Keywords :** Shanghai, Local Development, Urban Structure, Urban Planning,  
Planning History

## 一、研究背景與目的

上海在近代中國經濟發展史中一直是居於領導地位的城市。在四零年代就擁有全中國60%的工廠和61%的工業勞工。1949年共產革命後，其工業產出又佔了全國歲入五分之一，成為中國最重要的經濟基礎。在經濟改革開放初期，東南沿海經濟特區的開放，成就了深圳等城市的經濟快速發展，上海在經濟上之重要性驟降。然而在經歷八零年代的停滯後，上海在九零年代展現了驚人的經

濟成長率，尤其在高科技產業及金融服務業上再次成為引領全國產業發展的龍頭。而上海的浦東發展計劃更吸引了各方的注目。全世界都在關心，上海的經濟發展前景如何？因為，東南沿海經濟特區的開放只是中國適應全球-資訊化資本主義的“實驗”；而上海的開放將標誌著全中國政治的經濟政策明確由過去的國家主義（statism）向全球化轉向（Castells, 1999）！

我們關心的問題是，上海在中國國內與國際經濟上到底扮演什麼角色？它何以能被視為區域發展的“龍頭”？而都市空間改造計劃如何作為發展的工具？以及，中央和地方政府各扮演了什麼角色？

這個研究將提供一個清晰且扼要的上海經濟和都市空間結構變遷的歷史回顧，做為日後開展進一步經驗研究的起點。討論焦點將放在中央和地方政府的關係，以及上海這個城市的特殊性和地方動力（local dynamics）。同時，這個關於經濟結構變遷的討論，將連結著城市空間結構變遷的分析同時進行。最後，將提出一個分析架構探討九零年代後都市再結構所引發的社會衝擊。

## 二、文獻回顧：

在中國研究中，上海作為第一大都市以及其近年來的快速變遷吸引了眾多研究者的注意。關於上海經濟、歷史、社會、文化的研究可謂汗牛充棟。整體而言，與本研究相關的上海研究分為兩大類，一是關於上海經濟發史或現階段發展策略的研究；另一類是地理學或規劃學界做的關於上海都市和空間與土地使用的研究。

在與經濟相關的研究中，Naughton 有系統的說明了大都市在中國經濟中扮演的角色，尤其上海長久以來在國家整體歲入以及政治穩定上的關鍵位置(1995) Tian除了對上海的經濟歷史做了分析性的描述外，並針對改革後上海的外貿和國外投資進行考察，進一步將上海與廣東的經濟特區比較，點出了改革開放階段國家區域政策以及政治考量決定了這兩個地區在八零年代迥異的發展方向。Jacobs and Hong則分析了中國的區域經濟政策以及上海在長江流域發展上的龍頭地位。此外，一些中文著作也描繪了上海經濟的各個面向以及浦東發展的策略，可惜多為描述，缺乏分析(如劉：1993；蔡：1995；姚：1996)。

在上海都市與空間結構變遷與土地使用的研究方面，Ning在中國城市發展史中以專章描述了上海的崛起(1994)。Hyslop(1990)的文章提供了了解上海都市計劃及土地使用的重要基礎。Ning and Yan(1995) 則針對工業區用地之變遷做了有系統的整理。Gaubatz and Piper點出了新開發地區和傳統工業區、社區在空間和

功能上的分離。程(1987)、曹(1987)、鄧(1991)等的作品提供了上海地區地理和歷史的基本資料，可惜資料嫌老舊。

這些文獻都為本研究奠定了重要基礎。然而，我們要問的關鍵問題是，上海的空間結構變遷和社會經濟變遷的關聯是什麼呢？都市政策以及空間發展計劃在經濟發展中扮演什麼樣的角色？關於空間的描繪和研究不能脫離經濟政治結構的脈絡，而空間政策更在區域以及國家整體經濟發展過程中扮演了積極的角色，兩者之間的關聯需被細緻刻劃。這是本研究希望切入的角度。

### 三、上海城市經濟簡史

上海在鴉片戰爭(1839-42)後成為通商口岸，並逐漸被英、美、法等國瓜分為數個租界區。外國資本開始在商貿金融和工業部門投資。在二十世紀初它快速發展成為中國最大的貿易、金融、港口貿易和交通中心，聚集效應更吸引了越來越多本國工業的發展。到1947年，上海市人口僅佔全國0.9%，卻集中了全國60%的工廠。其工業人口佔全國工業人口之61%。工業發展帶來都市人口，尤其工人階級的快速成長。這個在1852年僅有五十萬人口的港口城市，到1949年人口已達五百萬。

1949年共產黨革命後，從五十年代初起，共黨政府著手促進工業化進程。此時的產業空間策略旨在消除沿海和內地間的區域不均等。在以內地為優先的策略下，上海的工業成長受到限制，而上海和國際經濟的連繫也被切斷。在毛時代，上海的經濟經歷了兩個結構性變遷：一、工業組織的轉變：中小型私有企業被合併或重組為大型國有企業。在1952到1956年間，上海的工廠數從25,878個減少到17,096個；而單位之平均工人數則從28人增加到58人(Tian, 1996:12)。國有大型企業成為主要的生產組織和利潤創造者。二、產業結構的轉變：新的城市建設指導方針是“變消費城市為生產城市”；並將上海的工業基礎從輕工業轉向重工業。在“先生產、後生活”的口號下，中央政府對上海的投資集中在工業部門。我們可以見到，1950到1978年上海工業基本建設投資佔全部投資的60%，而城市公共事業的投資僅為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的5.8%。工業投資又集中在重工業部門，以鋼鐵、機械等產業為主，共佔了工業投資之百分之八十以上。到六十年代，上海已成為中國第二大鋼鐵城市。而同時，上海原本興盛的商業和服務業部門被大幅縮減，房地產業則整個的被消滅。至於對外貿易，上海雖與其他四個沿海城市同享獨特的外銷權，但所有進出口公司都已成為國有企業，並直接受北京的控制。1952年，第二產業佔全市GNP的比重為52.4%，第三產業佔41.7%。到1978年，第二產業之比例上升為77.4%，而第三產業則只剩下18.6%。三十年間，上海戲劇化地從一個金融貿易中心轉變為為國內提供工業產品的工業基地。城市就業人口的60%集中於工業部門，地方財政收入也絕大部

分直接來自各大國營工廠，城市的各個產業都圍繞工業這個中心，為工業服務。

在與中央的關係方面，上海一直是全國歲入貢獻最大的城市。在1958到1982年之間，上海平均每年上繳85%的財政收入給中央政府。1959年，上海上繳的歲收佔全國財政收入的17.5%，這個比例至今沒有太大改變。中央政府體認到維持上海經濟發展的必要性，因為唯有如此才能保證中央得到相當的財政收入。五十年代中以後，中央政府開始放權給地方政府，允許地方在相當程度上掌握企業的管理權，以鼓勵地方之主動性和積極性。即使在大躍進和文革等年代，上海相對而言都擁有較高的地方自主性，其經濟復甦亦快於其他的城市。

#### 四、開放年代的區域發展

##### 1. 八十年代的停滯--與南方城市比較

1979年實行改革開放政策以後，沿海城市對外經貿、聯繫外資的優勢角色重新受到重視。新的空間戰略是先在南中國沿海建立經濟特區，再逐步開放其他沿海城市及其他區域。原本以內地為優先的產業政策至此轉向沿海傾斜。然而，做為一種經濟改革的實驗，從政治穩定的角度而言，中央政府寧可選擇較遙遠的南方省份和城市做為實驗對象，而不願冒險拿上海開刀。也因此八十年代，相較於南方城市如廣州、深圳等的迅猛發展，上海的經濟顯得相對停滯。如圖一所示，與廣東省比較，上海的GDP及其成長率從改革開放後一直低於廣東。上海的GDP成長率在1985和1991年之間甚至低於全國之平均成長率。尤其面對流通體制改革後原料價格的上漲以及各省市工業的快速發展，上海的輕紡工業首先受到各地新興工業的挑戰。而工業利潤的降低和企業留利比的增大又直接影響了上海市來自工業的財政收入。與此同時，隨著工業用地的擴大，工業污染的增加，使得長期滯後的城市基礎設施受到越來越大的壓力，城市的居住環境品質也更形惡化。做為中國第一大工業城市，上海在開放沿海的新空間政策中未能扮演先驅者的角色，而其本身的經濟社會危機也不斷擴大。遲至1990年後，上海通過浦東計劃被賦與與經濟特區同等的開放優惠政策，其經濟才得以開始快速發展。

##### 2. 政策轉向--九零年代的浦東計劃

九十年代初政策開始轉向。五個經濟特區的成功經驗促使開放政策成為全國性的政策，而上海的發展則被視為引導中國走向繁榮的龍頭。1990年國務院總理李鵬宣告了浦東計畫的誕生，並公佈了十大優惠政策，包括稅費減免，土地五十年到七十年之出讓，以及鼓勵發展服務業等等。尤其1992年鄧小平南巡後，浦東得到了更多優惠政策，在批准投資項目，發展證券市場等方面擁有更

多的自主性。中央政府並在浦東指定了全國最大的自由貿易區，以及開放外國銀行、金融、保險業在上海的業務。

為了建立一個良好的市場經濟的環境，浦東計劃試圖在三個層面上促進上海的經濟發展。一、改善上海的基礎設施和城市的服務機能。二、在老工業的基礎上促進技術轉型。三、期望上海的發展利益能"下滲"(trickle down)到整個長江流域(Tian, 1996; Jacobs and Hong, 1994)。隨著浦東計劃的開展，上海緊抓住這個歷史機遇，深化改革，加快對外開放和追求經濟成長。1995年，上海的生產總值達兩千四百億人民幣。從1992到1995年，上海的年GDP成長率連續四年超過14%（見表一），並且高於全國成長率(1995年的數字，上海為14.1%，全國為11%)。

在產業結構方面，政策方向為大力發展第三產業，積極促進第二產業轉型。上海謹慎調整其固定資產投資在部門間的比例。對三類產業的投資比重，從七五期間（第七個五年計畫）的0.9: 60.4: 38.7轉為八五期間的0.62: 34.7: 64.68。投資重點已明顯集中於第三產業(即服務業)。隨著金融、保險、銀行、房地產產業市場的開放，第三產業在GDP的比重已從1980年的21.1%上升到1995年的40.2%（見表二）。同時，第三產業所吸收的就業人口也從1980年的22.1%增加到1995年的35.7%（表三）。而表四也顯示，第二產業僱用了54.5%的勞動力而僅創造出57.3%的GDP，第三產業勞動力僅佔35.7%卻創造了40.2%的GDP。第三產業的生產力顯然超越第二產業。更讓人注目的是，上海的確在服務業部門表現了特定的優勢。區位商數通常用來展現區域與全國比較起來在某種產業的集中性。當某種產業的區位商數大於一時代表與全國比較起來，此一產業在此區域具有專業性和集中性。表五提供了上海各產業部門1993到1995的區位商數。在九十年代，區位商數超過二的包括製造業，水電瓦斯業，房地產業，社會服務業，醫療照護、運動和社會福利，教育、文化、藝術、電視、電影，以及科學技術研發等。而從趨勢來看，製造業的區位商數正從1993年的3.34減少到1995年的3.05，反之許多服務業部門則驚人的成長。1995年，房地產業的區位商數是6.09，而科學技術研發則是5.09，這證明了上海在服務業以及技術研發上的確獨步全國，極具發展優勢。尤其與廣東省比較起來（見表六），更可以看出廣東省的經濟發展還是以勞力密集的製造業為主。這凸顯了上海具有走出和外銷導向的南中國城市極為不同的發展道路。

改革開放後，外資和私營部門也快速擴張。雖然國營企業仍佔主導位置，企業所有權的多元化已逐漸浮現。從1980到1995，國有單位在上海的工業總產值的比例已從87.2%大幅下降到37.5%；集體單位所佔比例由11.6%上升到18.6%；而外資、合營、私營部門所創之工業產值則從1.15%急遽上升到44%。與此同時，在民營部門工作的就業人口也逐漸增加。在1980年還有幾乎百分之九十九以上的就業人口受僱於國營或集體部門，到1995年，受僱於“其他”部門（即

國營之外的所有形式的民營部門)的人口已達13.9% (表七)。

## 五、都市結構之轉化

### 1. 都市危機浮現

在八十年代以前，由於國家優先重視內地的開發建設，上海雖對中央歲入貢獻最大，並創造出全國工業總產值的18%，卻只得到國家3%的投資。而投資又偏重在工業生產，忽視城市基礎設施和住房的建設。長期城市建設的投入不足，使得城市環境日益衰敗。住房短缺、交通擁塞、環境污染都成為嚴重的都市問題。另一方面，過份強調工業生產和壓制服務業又使得內城的工業用地過多。1980年代初，上海內城地區的工廠達五千家以上，其中只有約三百家位於工業區內。工業用地佔了內城土地使用總面積的20%以上(Yang et al, 1991, cited from Ning and Yan, 1995.)。

衰敗的城市環境和過度飽合的工業用地成為上海發展的主要限制。改革開放以後，為了提供經濟發展的環境，增加城市的競爭力，對城市基礎設施、通訊、交通、公共設施等的投資開始大幅提高。1980年到1990年基礎設施經費達209億人民幣，七倍於前三十年之總和。而浦東計劃的開展更標誌著做為全球城市之一的上海做為一個長江流域，甚至是引領全中國面對全球化的中心城市，新一輪的城市擴張。伴隨著經濟的持續發展，九十年代的上海正經歷著跟根本的城市再結構。基礎設施和大型交通建設的投入，舊城改造，產業再結構，住房與土地改革等，都聯繫著上海城市新的空間組織。

### 2. 浦東計畫：城市擴張和基礎設施的改善

浦東新區面積522平方公里，位於黃浦江以東，長江出海口以西。為改善投資環境，近年來致力加大基礎設施建設之力度。1990至1995年間，浦東新區投資了160億人民幣於城市建設，佔總固定資產投資金額之30%。橫跨黃浦江的兩座大橋已通車，新機場也在1999年9月竣工使用。而包括深水碼頭，資訊港，發電廠，地鐵，輕軌，污水管道系統等計劃也在次第進行中。除了這些基礎設施建設之外，浦東新區已建立四個經濟技術開發區。陸家嘴金融貿易區，外高橋自由貿易區，金橋加工出口區，張江高科技園區等都已交出不錯的成績單。浦東的GDP已從1990的60240億人民幣成長到1995年的411800億，年增長率23%。而95年人均GDP達27,934元人民幣，遠超過上海地區之平均水平(上海統計局，1996)。

上海市政府對城市的產業佈局也做了很大的調整。浦東新區的優惠政策吸引了許多工業投資項目，也將上海的工業生產分散和擴張到浦東地區。而在新

修訂的規劃中，浦西內環線以內主要發展第三產業，現有的工業將逐步進行土地置換遷出。至1995年已有數百個污染性和虧損企業被遷出內城地區。而內環線以外的中心城邊緣地區，有高橋、慶寧寺、周家渡、長橋、漕河涇、北新涇、彭浦、五角場等八個工業區，一般而言不再新上大型項目，而將以目前具有一定專業特色的大中型企業原地改造完善為主，少量吸收市中心遷出的同類工廠，形成系列或必須的替代。外環線以外的二級市依據專業分工形成以支柱工業為主，並全面發展第三產業的城市體系。而外環線以外的農村地區，除了積極發展第三產業和縣、鄉、鎮工業外，並要從大城市城郊農業的特點出發，形成高附加價值的蔬果生產基地（陳海泓，1995）。

同時，上海市政府正努力加快舊城改造的速度，使市中心轉型成為金融、辦公、商業和購物區。上海在80年代後期在全國率先制訂了土地所有權有償出讓的法規。自九十年代開始，更積極在土地批租中，結合城市舊區土地再開發和產業置換，以充分發揮城市土地的級差效應。土地使用權出讓所得收入，在安置拆遷居民和動遷工廠等單位，完成所批土地的基礎設施改造後，還可以有相當部分用於城市基礎設施建設。1992-1993兩年間，上海共批出土地452幅，出讓面積7028公頃，其中浦西市區土地402公頃，收取的轉讓金中有100多億元用於城市改造和建設（陳海泓，1995）。對於上海這樣一個充滿商機的城市，土地批租政策有效發揮了吸引資金的效果。同時，房地產業迅速擴張，各類開發公司陸續成立。在上海的外資中有10%投入了房地產業。為了吸引外資，大規模的土地出讓和開發引發了居民區的大規模動遷。在1993--1995三年間，估計有8,596,000平方公尺的樓地板面積被拆除，210,000個家庭被動遷（上海統計局，1996）。老社區的居民經常被迫遷到郊區，而郊區的公共建設嚴重落後，醫院、學校、市場等服務設施不足，交通不方便，有時連甚至郵件都不通。1995年初，有數百人在淮海路上抗議對動遷計劃的不滿（Li, 1995）。動遷成為百姓最關切的議題。

### 3. 住房問題

住房問題也是經濟改革過程中另一引人注目的議題。共產黨革命後三十年上海住房短缺的現象長期未得到根本的解決。市區居民中每四戶有三戶屬於居住擁擠、生活嚴重不便或大年齡結婚無房戶。上海黨代表大會曾在報告中稱住房問題為“天字第一號問題”。經過多年的忽視，住房投資終於在1978年後開始增加。上海市住房資金從70年代初的5%上升到80年代的10%。居民的住房條件逐步改善。在1978--1995年間，上海共建成樓地板面積八千五百多萬平方公尺，其中三千五百多平方公尺是在1991-1995年間完成的。尤其住宅投資體制的改革是促成80年代上海住宅建設穩定增長的關鍵措施。改革強調多渠道籌資建房的重要性，調動各企業、事業單位的積極性，建立了一大批房地產開發公司，改變了住宅投資由全由國家負擔的局面。尤其經濟改革後企業單位從放權



讓利中逐步獲得較多財力，根據企業經營業績提取的各項專項基金，是企業建房的資金基礎。建房資金來源的多元化引起了住宅投資結構的變化，地方財政撥款資金比重明顯下降。1980年全市住宅建設投資中，地方財政撥款佔45.2%，中央基建投資佔20.5%，地方系統自籌佔34.3%；到1990年，地方財政撥款僅佔13.7%，其中還有45%是用於市政動遷的，地方系統自籌的上升到69.3%（陳海泓，1995）。上海的人均居住面積因而從1978年的4.5平方公尺增加到1995年的7.95平方公尺。然而，隨著經濟持續發展，農民工進城和流動人口的增加，上海市人口在1995年已近一千三百萬。市區之人口密度逐年增加，到1995年每平方公里達46,510人（見表八）。舊市區內的黃浦、南市、瀘灣、靜安等人口稠密地區每平方公里人口達六萬人以上，一些街道人口密度甚至高達十五萬人（上海市統計局，1996）。人口的膨脹使得住房問題更形嚴峻。

八十年代初中國開始在某些試點城市推動住房制度改革。原有計畫經濟下的住房制度是由工作單位將住房做為福利分配給員工，房租非常低，一般不超過家庭所得的5%。早期房改的基本概念是要藉由提高租金和鼓勵購買公房將住房從福利轉變成為商品。八十年代末，房改已成為全國性政策，各個城市紛紛推出自己的房改辦法。然而除了出售部份公房之外，住房制度並未得到根本的改革。1991年上海推出新的房改方案，內容包括“推行公積金，提租發補貼，配房買債券，買房給優惠，建立房委會”等。其中取材自新加坡經驗而由上海率先提出的住房公基金制度，是全體市民必須參與的強制儲蓄，職工和所在單位分別按工資水平和全市統一的公積金繳交率支付。透過個人長期儲蓄，在單位支持下建立個人的購房基金。到1993年底上海已歸集公積金40億元，94年又歸集了22億元。鑑於上海經驗的成功，住房公積金在九十年代中成為全國性政策，並於98年正式立法。

住房改革牽涉的層面很廣，而房改經過多年走走停停的實驗，也終於在1998年隨著實物分房的結束而開始進入另一個階段。總結前一階段房改的經驗，可說在出售公房方面進展最大。一方面經由提高房租造成“租不如買”的局面，一方面居民藉由公積金制度具備了一部份購房（購公房）的能力。但這些進展都只能說是現有公房的私有化過程而已。關於住房供給、分配與新興住房市場的關連等體制改革的幾個關鍵環節還是難有突破。例如居民購買力的提升與否牽涉到工資改革以及所謂“暗補變明補”的問題，即工資中的住房含量如何從福利（暗補）過渡到在工資中以貨幣體現（明補）。但工資問題牽涉太廣，短期內難有改革，因此需由住房補貼來解決。而世界銀行所建議的，經由住房的商品化切斷單位和住房供給的聯繫，藉以促進住宅市場的發展和勞動力的流動，事實證明完全無法實現。不論是趕搭房改最後一班列車（搶購公房），或是停止實物分房後的貨幣補貼，單位仍伴演了最重要的角色。單位效益的好壞以及解決職工住房問題的能力才是決定住房條件的關鍵。在國企改革的浪潮中，企業急於甩掉包袱並已造成了百萬下崗大軍。在連工資都不保的情

況下，又談什麼住房補貼呢？所幸絕大多數中年左右的職工能搶搭福利分房末班車的都已想盡辦法搶到了。最為住房問題頭痛的將是即將成家的新一代小家庭。也許新一輪的住房危機可以再拖個幾年再引爆吧。

## 六、 城市再結構之社會衝擊

在計畫經濟時代，包括住房在內的城市基礎設施建設都是為工業生產而服務的。城市空間的基本單位是一個個的國營工廠和其比鄰的居民社區，被一道道長長的圍牆所包覆。而人們的生活也環繞著這一個個的大院。社區裡通常提供了從托兒到醫療等各種服務，生產和再生產的空間緊密相連。然而隨著城市的擴張和工業區的外移，原本工廠和生活區混合的情況已大幅改變，城市功能性的分區逐漸浮現。而大規模的舊城改造和動遷更加速了城市往郊區擴張的速度，改變了城市人口的空間分佈，更戲劇性的改變了許多居民的日常生活。城市的尺度和通勤的距離變大。隨著居住區的外移和分散，通勤的需求對交通的壓力不斷增加，形成都市運輸日益嚴重的問題。

新的居住模式也伴隨著新的社會區隔。舊城改造的直接結果是高級化 (gentrification)。原有的住民在土地批租政策下被遷往三、四十公里外的郊區，市政府以此換取級差地租從事市政建設。原來均質的社會空間被打破，工廠大院的圍牆被“封閉式物業管理”的圍牆所取代。中低收入者（動遷戶）被拋置到嚴重缺乏公共設施的郊區。而入夜後繁華大街的霓虹燈下，則隱約瞥見無家可歸者瑟縮的陰影 (Li, 1994)。他們多是進城謀生的農民工，所謂的“盲流”或“流動人口”。這其實是城鄉移民問題的中國版本。

最後，隨著實物分房的結束，個人進入住宅市場購房將成為不可避免的趨勢。在福利分房時代，住房條件取決於單位好壞，基本上與收入無關。住宅商品化和市場化後，薪資收入將成為決定購房品質、區位的關鍵。而經濟改革後人們收入的分化正逐漸擴大。階級的區辨將在住宅市場中更清楚的呈現。再者，當家庭成為住房消費的基本單位時，家戶內男女薪資的差距是否也將影響性別的權力關係？統計顯示大城市中48.64%的家庭丈夫的收入比妻子多，而妻子收入比丈夫多的只佔10.28% (Shen and Young, 1995)。開放和發展程度越高的城市，夫妻收入的差距也越大。當購房成為小家庭最大的壓力來源時，女性的低收入是否會造成其家庭地位的下降，改變了原有的男女較平等的社會關係？這將是值得繼續研究的課題。

## 七、結論

本文討論了上海經濟發展的歷史及其對城市空間結構的影響。在過去被稱的國家主義模型中，上海與西方資本主義城市經驗不同的是，國家（state）一直扮演了最直接與關鍵的角色。上海人常強調中央“給政策”的重要性。在這個孕育了中國最早的現代工商業的城市，人們相信只要中央給了通行證，他們就能快速趕上發展的列車。然而事實上這個主導地方發展的主體也是國家，是地域國家（local state）。地方政府一方面主動引導城市的產業結構轉型，以突出上海在金融商務等服務業方面的優勢；一方面也積極引導城市空間的再結構以克服各種足以阻礙經濟發展的都市問題。工業的疏散、大規模的動遷、功能化的土地分區使用以及住宅市場的浮現都指向對市民都市日常生活的衝擊。許多研究者都認為，在全球化的壓力下，那些在世界上“成功地”再結構了的資本主義城市，它許諾發展的下滲效應往往排除了絕大多數的人口，甚至使他們的情況變的更糟，造就了日趨極化的分裂城市（Fainstein, 1990）。那麼，中國的城市呢？關於上海在快速發展進程中的社會衝擊，需要更多的研究來探索在經濟全球化過程中，城市即將面對的眾多都市的問題（urban questions）。所以，我們可以說：

1. 為了適應全球資本主義，中國在政治方向上做了調整，國家扮演了最關鍵角色。對地方言，地方政府既引導產業再結構，又引領空間之再結構。上海做為長江流域鉅形城市的中心之全球城市，浦東計畫標幟上海之轉型，而陸家嘴表現的是對金融中心之分工與聲勢。
2. 與全球化併存的不均等發展與城市極化趨勢，將隨視城鄉管理的成效而定。住宅問題、都市運輸問題等都市服務之不足，糾結在與動員的衝突性過程之中。

## 參考書目

- Castells, Manuel 1999, (revised edition), End of Millennium, Oxford: Blackwell.
- Fainstein, Susan S., 1990, “The Changing World Economy and Urban Restructuring”, in *Readings in Urban Theory*, edited by Fainstein, Susan S. and Campbell, Scott, 1996, Cambridge: Blackwell
- Fung Ka-iu, Yan Zhong-min, and Ning Yue-min, 1992, Shanghai: China’s World City, in Yeung, Yue-man and Hu Xu-wei, eds. *China’s Coastal Cities: Catalysts for Modernization*.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 Gaubatz, Piper Rae 1995a, “Urban Transformation in Post-Mao China: Impacts of the Reform Era on China’s Urban Form,” in Davis, Deborah S., Kraus, R., Naughton, B., Perry E. J., eds, *Urban Space in Contemporary China*. Washington D.C.: Woodrow Wilson Center Press.
- Hyslop, J.S. 1990, “The Spatial Structure of Shanghai City Proper” in Linge, G.J.R. and Forbes D.K. eds. *China’s Spatial Economy: Recent Development and Reforms*. Oxfor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Jacobs, J. Bruce and Hong, Lijian, 1994, “Shanghai and the Lower Yangzi Valley ” in Goodmann, David and Segal, Gerald, eds. *China Deconstructs: Politics, Trade and Regionalism*.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 Li, Cheng (1994). “Under Neon Light, Street People in Shanghai,” ICWA Letters. \_\_\_\_\_(1995). “Shanghai: City for Sale,” ICWA Letters.
- Naughton, Berry, 1995, “Cities in the Chinese Economic System: Changing Roles and Conditions for Autonomy,” in Davis, Deborah S., Kraus, R., Naughton, B., Perry E. J., eds, *Urban Space in Contemporary China*. Washington D.C.: Woodrow Wilson Center Press.
- Ning Yue-min and Yan Zhong-min, 1995, “The Changing Industrial and Spatial Structure in Shanghai,” *Urban Geography*, 16,7, pp.577-594.
- Perry, Elizabeth J, 1993, *Shanghai on Strike*.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Pudney, Swazzu ., Wang Limin Lourdes (1994) *Housing and Housing Reform in Urban China: Efficiency, Distribution and the Implication for Social Security*. London: Program of Research into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and public Finance, STICERD 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 Solinger, Dorothy J., 1995, “ The Floating Population in the Cities: Chances for Assimilation?” in Davis, Deborah S., Kraus, R., Naughton, B., Perry E. J., eds, *Urban Space in Contemporary China*. Washington D.C.: Woodrow Wilson Center Press.

Tian, Gang, 1996, *Shanghai's Role in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China: Reform of Foreign Trade and Investment*. Westport, Connecticut: Praeger Publishers.

陳海泓 1995 上海城市十五年 上海社會科學出版社

姚錫棠 編 1996 長江流域區域經濟發展論 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

劉君德 1993 “初評浦東開發與上海及長江三角洲區域經濟發展”

in 楊汝萬 編 中國城市與區域發展—展望二十一世紀

香港中文大學亞太研究所出版

蔡來興主編 1995 上海:創建新的國際經濟中心城市 上海:人民出版社

寧越敏等著 1994 中國城市發展史 安徽:科學技術出版社

程潞 主編 1987上海市經濟地理 北京:新華出版社

上海社會現狀和趨勢1980-1983 1988 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

上海市統計局 1986-1997 上海統計年鑑 北京:中國統計出版社

曹麟章等著 1987上海生產資料所有制結構研究 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

鄧偉志等編 1991 上海社會發展四十年 上海:知識出版社

